

允晨叢刊
25

大陸與海外

傳統的反省與轉化

劉述先 著

允晨叢刊 25

大陸與海外

——傳統的反省與轉化

劉述先 著

111
E2
183

111
Y25
183

允晨叢刊25

大陸與海外

作 者／劉述先

發行人／林伯峰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 服務電話：(02) 5072606 (代表)

• F A X：886-2-5074260

• 郵政劃撥帳號：0554566-1

排 印／嘉信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顧 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

定 價／180元

11F, NO. 21,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自序

——有關傳統與現代化的爭論

這兩年忽然又引起了有關傳統與現代化問題討論的熱潮。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就為了這個問題爭論不休，但在現階段提出這個問題，又呈現了一些新的面貌，問題的複雜性已不是前人所能夢見。由傳統到現代，貧窮落後的中國還在那裏奮鬥掙扎，進一步，退兩步，反動保守的掣肘力量依然強大，只能夠一顛一跛地向前摸索，簡直是舉步維艱。但是由現代到後現代，已經清楚地顯示出，盲目地發展科技會造成環境的污染與破壞，可以到達摧毀整個地球上人類文明的危殆境地。而高度發展國家經濟力量的膨脹並不能帶來全民的福祉，落後地區對於列強的依賴只能使它們更深一層地陷入泥淖之中，而發展中的國家雖然已經多少能够分享到富足的生活，未來究竟要往怎樣的方向走，仍然缺乏一幅清楚的圖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發現了一種奇異的兩極化的傾向。一方面有人狠批我們的傳統所給與我們的

負累，好像不把傳統的包袱徹底拋棄，就沒法子向前進步；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對居於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產生強烈的反感，不能夠聽任白人中心的思想肆虐，摧毀世界上其他有價值的傳統，而發出一種救亡的呼號。事實上西方的有識之士也在深入地批評反省自己，而不再武斷地自以為是。這是一個世界上每一個傳統都需要對傳統與現代化問題作最深切的反思的時代，它與未來世界人類的前途有著休戚相干的關係。

我們既然生而為中國人，當然只能通過中國人的視野來加以批評反省。很遺憾地，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反思還停留在十分浮表的層次之上。我們由清末開始就在追求富強，到現在這仍然是一個遙遠不可及的目標。我們不斷周而復始，經歷了自我衛護與艷羨他人的世代交替。近百年來，在一方面中國已經有了驚天動地的劇變，由清廷的顛覆到大陸的變色，滄海桑田，簡直令人難以想像，但在另一方面，由文革的鎖國到現在的開放，對比於清廷的開放海禁，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很難教人不興起一種原地踏步的感覺。令人心酸的是，那麼多的苦難都逆來順受頂過去了，留下的還是執著的知識份子的激情：用激情去反傳統，用激情去求開放，但激情有沒有給我們帶來預期的效果呢？遺憾的是，最洶湧澎湃的激情只給我們帶來了文革時期最巨大的破壞。我們似乎還是缺乏冷靜的理智、深刻的智慧、與根本的決心來探討出問題之癥結之所在，眼光老是被眼前的實用所拘限，結果乃如醉漢，扶得東來

西又倒。今天做這個，這個行不通就打這個，明天做那個，那個行不通又打那個，試問一切都打完了，現實依然故我，積重難返，乃至出現了加速度的崩壞之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民族的自信心由何建立？怎不叫人憂心忡忡！

僻居海隅，與轟轟烈烈的實際改革行動既完全拉不上關係，乃只能埋頭做自己的研究教學的工作，同時以知識份子的關懷，做一些有關國家民族文化問題的反省的活動。一九八六年，我由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到新加坡去做半年的研究，打算由發展的觀點去剖析周易思想的四個層面：神秘符示、自然／理性符示、宇宙符示、與道德／形上符示，而建立一個了解周易的統觀。剛完成了前面兩個部份，滿擬返港以後，把後面的部份也儘快地做出來。那知就被捲入到對於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爭論的熱潮以內，由於這一個問題的重要性與在時間上的緊迫性必須當機加以回應，我遂摒擋一切，專門閱讀與這一方面有關的文獻，並寫出了我自己的意見。二三年間不知不覺長長短短竟已積累了二十多篇文字，牽連的面雖廣，中心的思想卻是一貫的，於是彙編成冊，雖然對於解決問題之道，未必能夠提出什麼實際可行的方案，但通過論難與質疑的方式，卻希望在反省的層面上，確立一個轉化的方向。

這二十多篇文章依照其性質，大體可以分成三類，分隸於本書的三個部分之內：

第(一)部：大陸的反思，

第(一)部：海外的質疑，

第(二)部：轉化的方向。

茲將各文的內容略加簡介，乃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一脈相承的線索。

第一部分共有十篇文章，主題是大陸的反思。

第一篇、〈思想文化危機還是現實危機〉，是《九十年代》李怡、方蘇兩位為我作的訪談，由方蘇整理完稿。《九十年代》雜誌的重點雖放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現實問題之上，卻不忽視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八八年的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多他們就來訪問我，除了我中間要上一堂課以外，一直談到下午四點，方蘇更單獨留下來和我談到六點多鐘才散，但很多問題還是沒有談完，要用其他資料來補充。方蘇寫了初稿，由我訂正之後付印。這篇訪談討論到當前大陸思想界最富活力的三個潮流，以湯一介（中國文化書院）、金觀濤（走向未來、科技發展）與甘陽（人文、解釋學）為代表，然後加上我自己的觀察包括對於當代新儒家思想的反省。在海外雜誌上對當前大陸的思潮有這樣的介紹與討論，大概還是創舉。這篇文章後來在臺灣轉載，為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提供了必要的資訊。由於這篇文章定下了我的思想反省的基調，所以放在開頭，後面的分論有了這個背景才比較容易把握其意義。

第二篇：〈由兩篇文章看大陸思想發展的契機〉，是一篇短文，提供了兩個範例，對比

了思想的僵固與發展的兩種不同的型態。

第三篇：〈論興盛與危機〉，是一篇兩萬字的長文，乃是我在近期的一篇力作。金觀濤與劉青峯伉儷由系統論、控制論的觀點提出了他們對國史的新說，在大陸上因反對經濟決定論而引起了巨大的震盪。他們的書被翻印在臺灣出版，立刻成為暢銷書而變成了熱門的話題。但對這樣的書雖則毀譽不一，卻缺乏在學理上加以客觀地批評、深入地檢討的作品來加以回應。所以我花了很大的勁介紹了他們的思路，由方法與內容上加以徹底的解剖，給與他們的努力嘗試以一個適當的評價，並指出他們的根本限制所在。

第四篇：〈關於文化的批判的反省〉，是我應《中國論壇》之請，對於甘陽的一篇文章所寫的回應。甘陽主持一套翻譯叢書，他本人翻譯了卡西勒的《人論》，專門研究歐洲的人文學和解釋學，他由文化的批判的角度寫了一篇文章介紹當前歐洲的思想的指向。他並不知道我在三十年前便翻譯過《論人》。他把卡西勒當作解釋學發展的先驅，我不贊成這種說法。卡西勒的思想由新康德派的思想轉手，基本上是一種廣義的理性主義的思想。但海德格的思想卻有非理性主義思想之嫌，在一義下影響了當代歐洲思想發展的主流，而我對這一類的思想有很大的保留。解釋學提及傳統不通過現代的解釋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很深刻的客識。但甘陽似乎意謂如此則我們儘可以自由塑造我們的傳統，這並不附合高達美的原義。在

甘陽主編的《文化、世界與中國》第一期之上刊載了余英時的長文，略謂西方為外傾的文化，中國為內傾的文化。同期甘陽的文章卻反對任何中西文化差異的說法，認為這助長了中國毋需向西方學習的態度的兇獃。我很欣賞大陸年輕一輩學人要突破一切傳統藩籬的衝動，但不很贊同他們的學術的觀點。

第五篇：〈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抉擇〉，是一篇派生的作品。《當代》有人撰文，詬病海德格在二次大戰時親納粹的行徑。我指出海德格的實際行為雖不能由他的思想直接推行出來，但他思想的非理性主義的傾向可能導致他一時的失足。而我抗拒時流那種非理性主義的傾向，反過來強調對於超越的理性規約原則的終極託付。

第六篇：〈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後現代化的問題〉，是我對於包遵信的回應。包是主張全面對外開放的健將，他對當代新儒家思想頗有微詞，他覺得儒家的傳統不外是綱常之說，對於現代化的過程造成了障礙的作用。我覺得他對當代新儒家、尤其我個人的思想頗多誤解之處，故為之予以彈正。他的思想失之於過分的簡單化，難以言之成理。同時打儒家這樣的死老虎並不能真正觸及當前大陸阻礙進步的根本癥結問題之所在，在問題的層次上應該加以更清楚的分疏。

第七篇：〈儒家能否抵禦西方歪風？〉，是我看了復旦大學與臺灣大學在新加坡辯論的

電視節目之後，隨手寫來的一篇遊戲之作。有趣的是，大陸的學生能夠隨意引用余英時、杜維明的說法，表示他們很注意這一類的問題，反而臺灣的大學生不大能夠談這一方面的問題，他們對於實際經濟問題的了解，遠超過他們對於思想文化問題的了解。辯輸了並不見得就代表理虧的一方，但有理而沒法子把理說得清，這就表示根本還不能掌握到道理的精義，以至辯論起來給人的印象是理不直，氣不壯，所差的還不只是辯論技巧的不足，而是義理了解上的隔閡。

第八篇：〈理論探索與實際效用的差距〉，是我在參加了新加坡的「儒學發展的問題與前景」研討會之後所寫的記感之作。這個會議集合了大陸、臺、港、海外的精英於一堂，對於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有熱熾的討論與辯論。在會上固然呈現了巨大的個別差異，但也顯露了大陸學者與海外學者視野的差距。一般說來，大陸學者偏重實效，覺得封建遺毒猶存，必須徹底加以剷除，故對於儒家雖作了局部性的肯定，主要強調的是儒家傳統的負擔；海外學者則偏重理論的探索，親身體驗到現代的西方並不是樂園，必須要尋找一些不同的東西來加以對治，故對於儒家的嚴重的限制雖不加諱言，卻更側重在強調儒家可能作出的積極的貢獻。在進一步的接觸中，乃可以發現，表面上同的並不一定真的相同，表面上異的也不一定真的相異，這些問題都還需要我們作深一層的省思和考慮。把這篇文章和第一篇文章對照，

讀者應該可以找到一些互相關連的地方。

第九篇：〈關於劉賓雁與第二種忠誠〉，是我在八五年發表的一篇短文，那時海外的輿論界對於劉賓雁發出一片贊揚之聲，我卻與衆不同，唱了一個小小的反調。我對劉賓雁的道德勇氣十分佩服，但他的思想還跳不出效忠黨國的規模。只有在一個建立了民主法治的社會之中，人們才可以過平常的生活，用不著包青天、劉青天的保護。當時我的言論是孤獨的聲音。但後來王拓在訪問過大陸之後，在香港文化界歡迎劉賓雁的宴會上，卻發表了和我類同的論調，可見臺灣已漸漸走進了另一個階段的發展，在目前的大陸我們當然還非常需要劉賓雁，但我們的希望卻是，將來總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劉賓雁。

第十篇：〈中國走向未來在思想上面臨的障礙〉，我明白地指出，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除了有形的障礙之外，更嚴重的還有無形的思想的障礙，必須加以克服，未來才能有真正的轉機。

以上十篇文章構成了第一部分的內容。有人或者會覺得我對大陸的學術思想、意識型態有十分嚴厲的苛評。事實上我一向對於與大陸的學術思想交流，推展不遺餘力。我對大陸知識份子種種不利的條件之下做學術工作，冒著衝破禁區的危險，提出自己的見解，實在是十二分的敬佩，也充分地體認到他們的追尋的那種嚴肅的意義。但我們在海外，唯一的好處

就是自由，必須本著知性的真誠，就事論事，把自己的心聲表露出來，而不能把學問當人情，於己於人，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好處！而大陸學者或許因為受到了我們自己的傳統以及馬列傳統的影響與局限，多情勝於理；而面對著四個堅持那四座大山，也有著難以正面逾越的苦衷，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建立杜維明所謂中國知識份子的羣體的自我批判的意識。

第二部分共有六篇文章，主題是海外的質疑。其實對於傳統的反感決不只限在大陸的學界以內，海外一樣對之有很深的懷疑，隨時在文章與言論之中表露了出來。

第十一篇：〈中國人與歷史〉，可謂我是有感而作。過去中國人一向驕傲於我們的歷史悠久，文化卓越，但是到現在卻起了根本的變化。現在的中國人已經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乃至否定自己的歷史，偶而引用自己的歷史，也常常是一種歷史的誤用。歷史越悠久，我們的歷史包袱也就越沉重，以此對之提出質疑，不能不說是一個最自然的現象。

第十二篇：〈論所謂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我寫這篇文章是針對孫隆基的書而發。學生們常常問起我對於這本書的意見，我因為沒仔細讀過這本書，所以無詞以答。現階段我既在清理有關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也就不能不對這樣有影響力的東西有一個回應。一九八七年尾我到廈門大學去開國際朱子會議，筵內就只帶這一本書，一有空就隨時翻閱，終於弄清了他說的是什麼，回來以後即著文加以剖析，澄清相關的一些理論效果。原來孫隆基所謂

的「深層結構」與深層心理學或結構主義者所謂「深層結構」那種嚴格的學術用語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只是對於中國人長期積累的一些心習有一些敏銳的觀察。他所強調的正是這一類心習的負面性，與柏楊的東西可以互相呼應。這些分析與哲學義理的闡釋或者歷史考證的研究並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孫隆基的用意大概是要中國人自覺到這樣的心習的缺點而加以超越，才能够走得上一現代化的道路，這還是五四以來，魯迅的《阿Q正傳》、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的延續。這樣的書當然也自有它的效用，只是不必把它當作嚴格意義之下的學術論著看待，那是根本弄錯了這本書應有的位置。

第十三篇、〈與丁肇中教授論中國文化與格物致知〉，丁教授在中大獲贈榮譽學位時，我因故未能參加儀式，但看到他的講詞的時候，立刻就感到心有未安。後來這篇講詞在報紙上發表，乃決定撰文加以回應。丁教授是諾貝爾獎金的得主，當然是學有專長。但他並不是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的專家，講《大學》也只是在發表他自己的感想，並不是就著原典講這篇文獻的涵義。為恐一般人弄不清學問之間應有的分際，故不得不作此文加以彈正，以澄清社會上的觀感。丁教授是實驗物理學家，乃感覺到這方面在傳統資源之缺乏。他提倡實驗與創新的精神是不錯的，但他對傳統的一些批評是建基於傳聞的誤解之上，具備有相當的典型性，我只是借著這個例子，來澄清這一類常見的誤解。

第十四篇、〈關於儒家與政治學的討論〉，友人水秉和君對於政治學有相當研究，也有一些思想和反省。但他這篇文章發表在《知識份子》上，對於儒家的觀點顯然有一些誤解，我乃撰文加以回應。因《知識份子》未能刊登我的文章，在臺的友人乃把它發表在《鵝湖》之上。弄西方政治學的人在傳統之內往往找不到實行民主的資源，這也是一種很典型的意見。究竟在東方，包括日本、印度在內，是不是能夠產生真正的民主呢？這還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大問題。

第十五篇、〈儒家與民主〉，是一篇登在報紙上的短文，對於儒家與民主的基本觀念有一簡要的澄清。

第十六篇、〈關於儒家思想與文化危機的再反思〉，是針對友人殷惠敏君發表在《九十年代》的一篇文章的回應。由科學和民主，必然要再深一步，牽涉到思想與文化的問題，我針對殷君的論點發表了不同的見解。以上六篇文章構成了第二部分的內容。海外考慮問題的角度與大陸完全不同，但對傳統還是提出了一些根本上的質疑，一樣亟需加以澄清。

以上兩個部分的文章多數是以論辯的方式出之。必須抱歉的一點是，由於篇幅的限制，我沒法子把對方的文章也附印在書中。但我負責的只是說明我自己這一方面的觀點，讀者要對相反的觀點有興趣的話，我已註明出處，讀者不難找到這些文章，可以比對兩方面觀點的

差異。真理決不怕辯，總是越辯越明的。在這本書裏和我展開論辯的極大多數是我熟識的朋友，我們儘可以辯得面紅耳赤，但不必損及彼此之間的友誼或互相尊重。而這也正是我要建立的新風格，絕對不要重新陷落在舊時代黨同伐異的機括之中。但光破不立，究竟不是十分理想的情況。我自己也有一些積極正面的提示與構想，這一組的文章乃構成了第三個部分的內容。

在第三部分之中共有八篇文章。友人林毓生君提出了「創造的轉化」的觀念，而這恰正是個人歷年來努力的目標。我自己從來不自命為新儒家，這是因為一生之中，我從來沒有勸人或要我自己去學做聖人。但我的思想顯然與上二代的當代新儒家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也可以說，我是孕育自他們的思想之內的進一步的發展，我的探索是以他們的思想為起點。無論我的思想是優或劣，兩方面比較起來，的確表現了不同的特色。而我的思想尚未完成，所以沒有定本，只能夠講探索與創造的轉化的方向，而當代新儒家的思想儘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仍然有許多重要的資源可以應用。

第十七篇、〈有關現代與後現代的省思〉，大體陳述了我對現代、後現代的一般觀點，想必大家已經熟悉了我這樣的思路。但在這篇文章之中我卻講出了一個新的意思，雖然並未能够講得十分明白，只是以一種暗示的形式出之。以往講一個思想的完成總要弄出一套藍

圖，像康有為的大同書之類。但進入到現代以後，世界的變化瞬息萬狀，很難再弄出一個什麼確鑿的藍圖。有之只能是對於超越理性的終極託付，而這是與現代的多元社會結構不相違背的。理一而分殊，故此未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乃是不再去找尋一個獨一無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樣的流走自很難滿足世智的要求，好像太空泛了一點，但這卻牽涉到進入現代以後人的根本思維方式的改變的問題。我不是要人不要針對實際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確定的方案，而是說任何方案都不可能維持永遠，而必須隨時準備應變，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所以根本並不需要一個定本。而吊詭的是，這恰好合乎「哲學」是不斷地作「哲學思考」的古義，於今又得到了它的最新的詮釋與印證。

第十八篇、〈當代新儒家思想批評的回顧與檢討〉，這是我在八七年新加坡開工業東亞會議所提出的英文論文的中文本。我總結了當代新儒家的一些思想的特質與綱領，卻由內部的觀點加以批評檢討，指出其根本的局限性所在，必須在精微處也認真改絃易轍，才能够真正轉化過來與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結構變得水乳交融，不再有潛在的矛盾衝突或者背道而馳的現象。

第十九篇、〈當代新儒家可以向基督教學些什麼？〉，這是我在中大哲學系與宗教系與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合辦的儒耶對話的國際會議所提的論文。我指出儒家是內在超越

的型態，基督教是純粹超越的型態，如今兩個古老的傳統正面臨著相同的現代科技、商業社會的挑戰，而思有以因應之道，彼此顯然有許多互相可以借鏡的地方。當代新儒家自不會放棄自己的終極關懷，但在超越的本體（上帝）、世界、與人三個方面都可以向基督教學習到一些深刻的審識，而造成自我的擴大與深化的成果。

第二十篇、〈由天人合一新釋看人與自然之關係〉，這是我去參加漢城奧運世界學術會議所提出的英文論文的中文本。天人合一這樣老掉牙的觀念到現在還有任何意義嗎？由現代到後現代，科技發展到一個更高的程度就會發現科技本身所有的限制，無限制地發展科技、破壞地球的生態將把整個世界人類文明帶進一個危殆的境地。西方所謂征服自然其實是一個有偏差的觀念，畢竟人要與自然和諧相處，而這正是天人合一的一個重要的涵義。我在一九八七年夏在聖·地牙哥所宣讀的國際中國哲學會的會長講詞：「周易的功能統一觀」（英文）曾經指出天人合一的四種涵義；神秘（巫術）的，科學的，宇宙論的，與道德形而上的，這些經過「解消神話」（demythologization）的手續之後，都未可取消其意義與重要性，而必須給與它們嶄新的現代的詮釋，以及適當的定位。「理一而分殊」的審識在今日竟可以發展出以往所不能想像的豐富的涵義，而這些正指點出我在目前所做的理論建構工作的大方向。